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

曾向红 梁晨^{**}

内容提要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中最具影响的两个恐怖组织。相对于“基地”松散的层级状结构，“伊斯兰国”发展出以等级制和集中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本文通过借鉴社会演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为这种演化提供解释。通过考察后可以发现，中东地区“碎片化”的政治版图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动荡的政局，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在继承并内化其“先驱者”扎卡维“建国”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并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家”。“伊斯兰国”建立的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其他恐怖组织不具备的优势；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结构也存在明显弊端，其存续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一旦受挫，包括“基地”与“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仍将继续演化。

关键词 国际恐怖主义 “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

* 本文系周明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萨拉菲恐怖极端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新疆安全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4CGJ016）与杨恕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D01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国别与地区培育基地”建设资金和“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的资助。感谢《中东问题研究》匿名审稿专家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赵广成副教授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

**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梁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宣布成立。自该组织成立后,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先后对其进行了打击,尽管发展势头目前已遭到遏制,但尚未被彻底击溃。在国际恐怖主义的整体发展态势中,“伊斯兰国”似乎已取代“基地”头号恐怖组织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不能忽视并需要全力以赴加以应对的恐怖势力。本文以组织结构为切入点,对“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与“基地”相比,“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有何特别之处?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为何会出现变化,即为什么“伊斯兰国”能够发展出以集中和等级制为特征的组织结构?

一 问题的提出与现有成果评估

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大体而言,“基地”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松散的层级状结构。这种层级状结构由内而外分为四层,越往外,该层同“基地”核心的联系越弱,“基地”对其控制也越弱。而“伊斯兰国”则建立了一套以等级制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共分为四级:由上到下依次是,易卜拉欣哈里发、哈里发的地区代理人、舒拉议会以及沙里亚委员会、分管具体任务的职能部门。无论是从组织结构的效果还是从整体作战能力来看,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由松散的层级状结构变为以集中和等级制为特征的“准国家”结构,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演化。然而,对于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结构所发生的演化,国内外学术界虽然有所注意,但尚未出现系统研究这一问题及探讨导致这种演化动因的研究成果。

如以学术界对“基地”与“伊斯兰国”的研究为例,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伊斯兰国”的研究。关于“伊斯兰国”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集中探讨“伊斯兰国”兴起的原因。尽管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普遍承认“伊斯兰国”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美国入侵伊拉克所带来的政治恶果;2011年中东变局所带

来的秩序混乱；美国再平衡政策的负面效应。^① 第二，分析“伊斯兰国”兴起后带来的影响以及地区、世界局势的走向。学者们普遍认为，“伊斯兰国”兴起后，造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将掀起地区恐怖浪潮并且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② 第三，以“伊斯兰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主要特点、行动方式、资金来源、行动战略、宣传策略等，认为“伊斯兰国”在某一方面的高效运作增强了其实力。^③

其次，关于“基地”的研究。“基地”与“伊斯兰国”相比，兴起时间较早，学者们对“基地”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究，包括“基地”崛起的原因、产生的地区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等。自“伊斯兰国”崛起后，关于“基地”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即关于“基地”的研究多与“伊斯兰国”挂钩。学者认为，“伊斯兰国”是“基地”的进化和变形，“伊斯兰国”所采取的“建国”策略也是“基地”战略发展的未来

-
- ① 相关研究见李绍先《“伊斯兰国”崛起与国际反恐新难题》，《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Adham Saouli, “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 i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3, July 2015, pp. 498 – 500; Raphael Lefevre, “Is the Islamic State on the Rise in North Africa?” i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9, No. 5, November 2014, pp. 852 – 856.
- ② 相关研究见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张金平《“伊斯兰国”突起及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变化》，《国际观察》2015年第1期；王联《“伊斯兰国”的兴起于极端主义在中东的扩张》，《亚非纵横》2015年第1期；Marco Marsili, “The Islamic State_A Clash within the Muslim Civilization for the New Caliphate,” 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9, No. 2, September 2015, pp. 1 – 25; Andrew Phillips, “The Islamic State’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5, August 2014, pp. 495 – 498.
- ③ 相关研究见张金平《“伊斯兰国”武装活动特点及走向》，《国际论坛》2015年第2期；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策略动员和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李景然《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Haroro J. Ingram, “The Strategic Logic of Islamic Stat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6, August 2015, pp. 746 – 747; Haroro J. Ingram, “Three Traits of the Islamic State’s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he RUSI Journal*, Vol. 159, No. 6, June 2014, pp. 1 – 8; Kathleen Bouzis,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_U. S.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0, June 2015, pp. 885 – 894.

趋势。^①

再次,关于“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架构的专题研究。系统探讨“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架构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散落在论文之中。如,王晋在《“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一文中探讨了“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但篇幅并不长^②;曾向红、陈亚州在《“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与策略选择》一文中提到了“伊斯兰国”的组织架构,但文章中心并不在此。^③除此之外,对“基地”组织结构的研究成果则更少。此外,现有的对“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研究仅限于独立研究的领域,并未进行对比研究,因而对其深入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本文研究从组织结构的视角出发,借鉴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演化理论,分析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限制(Constraining/Enabling)、学习(Learning)、选择(Selection)、建构(Constituting)、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Anti-socialization or ideational resistance)^④,来分析“基地”与“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差异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

二 社会演化理论及在理解恐怖组织结构演变上的适用性

本文所要借鉴的理论主要为国际政治学中的社会演化理论,以下部分也将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 演化及社会演化理论

人类社会和生物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学者唐世平在综合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演化发生的基本条件。首先,演化只能发生在系

① 相关研究见钮松、徐曹宇《“基地”组织当前“建国”活动及其走向》,《亚非纵横》2014年第3期;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张家栋、朱道运《“基地”组织现状与发展趋势》,《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之一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John Turner,“Strategic differences: Al Qaeda’s Split with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n *Small Wars & Insurgency*, Vol. 26, No. 2, March 2015, pp. 208-221。

②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

③ 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

④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7.

统之中。系统有两个特点：第一，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变化；第二，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① 如果不存在系统，就没有单元之间的多样性，也就没有了选择压力，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演化。其次，演化只能发生于由生物体构成的或者由生物体开发的系统之中。或者说，只有存在生物体的系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的系统。因为系统演化的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只有在系统内关键单元（key units）的配合下才能完成。因此，系统如果没有这一生物基础，这个系统可能是一个会发生变化的系统，但它不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的系统不但是可变的，且其变化须依靠特殊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才能完成。再次，演化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展开。任何改变都需要时间的介入，而单元之间以及单元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也必须在空间层面展开。^②

如果一个系统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只有通过演化的方法才能真正理解系统以及系统的转变。唐世平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以及国际政治的历史演变指出，到目前为止，只有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才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因此只有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系统，故只有运用演化的方式才能完整地理解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③ 社会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能简单、机械地将生物演化论套用于人类社会。在生物系统中，完全是物质力量（material force）在起作用，而人类社会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精神力量（ideational force）的介入。尽管精神力量的出现本身就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但它一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当然，精神力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物质力量不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相反，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驱动着社会的演化。正因如此，与生物演化相比，社会演化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因此，必须依靠协调处理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才能更好地阐释人类社会的演变。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 《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页。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3 - 14.

③ 关于社会演化理论以及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的详尽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由于人类社会和生物系统存在重大差异,因此生物演化中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必须经过调整后才能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生物演化中,变异本质上依靠三个随机的机制:DNA的破坏、基因材料的交换或重组、外来物种的入侵。与生物演化中的变异相对,社会演化中观念层面的变异(新观念的来源)为:新观念的自生、观念的互补、外部观念的入侵。生物演化中的变异是盲目的,即生物体也不知道何时变异以及这种变异是否有利于物种的存续。与生物演化中的变异不同,社会演化中观念的变异不是随机和盲目的,它是有意识的,总是带有人们的某些期许,因为人为的解决问题或达到某种目标与预期可以创造或者引入某种观念,并且现存的社会结构有力的决定了何种观念会产生、被选择和遗传。^①

在社会演化中,选择压力来源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物质维度,即某种观念能否提高人的福利水平,依然是某种观念能否被选择的根本因素。但是精神维度在选择将何种观念付诸实践时是更加直接的选择力量,因此,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支配着社会演化的精神维度。^②在遗传机制上,生物演化中的“魏斯曼障碍”(无法实现从表现型到基因型的遗传)在社会演化的精神维度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可以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获得前人的经验与知识。因此,观念基因(如观点和想法)和表现型(如制度和文化)作为习得特性,都可以直接传递到下一代。唐世平将这种遗传方式称为“超级拉马克遗传”(Super-Lamarckian)。但是每一代人不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前人传递下来的基因和表型,他们会对这些前人留下来的基因和表型进行选择,这一选择同样遵循“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因此可以说社会演化精神维度的遗传机制是“内嵌于超级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an Nested within Super-Lamarckian)。^③

(二) 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演化的系统

社会演化理论吸纳了社会系统范式。因此,在本体论上,社会演化理

①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2-23.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5-27.

③ 唐建 《系统、时间与社会进化——评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2期。

论倡导系统研究。系统有两个特点：其一，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变化；其二，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① 相应的，将社会演化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时，也应当以系统的方法来分析国际系统的变化。

系统的研究方法以社会系统范式为指导。在本体论上，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包括它们各自拥有的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复杂系统。^② 系统研究要求在研究系统中的某一现象时，应当兼顾系统中的所有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使用简单化的因果关系、线性思维、单一视角来分析特定现象。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理论或多或少的都与系统的研究方法有所背离。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兴起，将结构的研究推到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地位。首先，什么是结构？根据沃尔兹的观点，结构由三部分构成：组织原则、单元的功能区分、能力的分配。国际政治中的结构也由这三部分构成：就组织原则而言，国际社会缺乏最高的权威，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单元的功能区分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黑匣子”，是单一的、理性的政治实体，因此在沃尔兹所定义的结构概念中，唯一可变的的就是国家间能力的分配，国际体系格局是两极还是多极也由此而确定。在国家行为方面，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给定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它们均受到体系物质结构的限制，对客观环境做出行为反应在方式上是一样的。因此，在国际体系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的行为也是相对稳定的。在利益方面，国家最基本的渴望要求国家的全部行为动机从考虑自身而不是他人的利益出发，即所谓国家生存的自助原则。国家的根本利益表现为对权力、安全和财富的追求，这是国家行为不变的目的。^③ 因此可以看出，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更多的是物质性的，即一种结构选择。

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对的，持观念主义本体论的建构主义对国家的行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 《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3页。

② 唐世平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

③ 刘永涛 《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11期。

Wendt)。建构主义在解释世界政治方面提出了三个核心的观点:首先,建构主义强调规范而不是物质,重视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其次,强调行为体的社会认同构成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最后,强调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在物质结构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即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建构主义通过考察国际体系的社会含义及价值结构,而不是基于单纯的物质权力结构来理解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如果不理解国家所处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就无法理解国家需要什么。建构主义认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的是认同和身份,而认同和身份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受到国际政治过程的塑造。故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就是要分析互动过程如何产生和再产生出影响行为体认同和利益的各种社会结构。建构主义赞成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中缺乏最高权威的基本假定,但同时相信规范、认同、文化、学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①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行为的改变是源于一种社会习得。

显而易见,当提到对结构的定义时,沃尔兹和温特分别处于物质主义到观念主义两极的两端。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占据了其中的某个中间地带。当然,沃尔兹和温特在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从社会系统的视角出发,即便对结构有一致的认知,仍然不能对国际政治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因为国际结构只是国际系统中的一部分内容,这种仅强调“结构—行为者”互动的分析模式会使得理论遗漏许多系统内其他层面的因素,因而对国际行为体行为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

唐世平提出了国际系统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Channels),即限制(Constraining)、学习(Learning)、选择(Selection)、建构(Constituting)、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Anti-socialization or ideational resistance)。^②

(1) 限制。限制指国际系统中的外在环境塑造行为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体怎样塑造彼此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三方面:首先,外在环境限制行为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行为;其次,外在环境可以促成行为体在精神上和

^① 张建新 《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及其社会结构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7.

物质上能够做成什么；最后，行为体彼此也可以相互约束或促进。

(2) 学习。学习是行为体认知系统，然后相应调整其行为中最关键的过程。只有国际系统内的行为体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系统，否则行为体的行为将会受到排斥。学习，广义地说，是行为者（如国家内的个人）形成和选择新观念，保留和加强旧观念的过程。因此，学习体现了社会演化过程中观念演化的过程。虽然学习发生于观念领域，不是必然的导致行为体行为的改变，但是行为体行为的改变往往紧随其后从而可以反映出某种类型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习的过程及内容可能不是客观正确的，所以学习也并不必然导致行为体的某种优化或者福利的提升。依据不同标准，学习有不同分类方式，其中最重要一种便是将学习作消极和积极的划分。消极学习，指行为体借鉴自己或他者的消极经验，这种学习通常是行为体在与系统中其他单元（结构和外在环境等）的互动中形成的；积极学习则指行为体采用自己和他人“成功”的观念、行为、文化和制度。因此，积极学习也被称为模仿或仿效。由于行为体在与系统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的各项行为受到系统的制约并且可能面临系统压力的冲击，行为体的应对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一过程中包含着行为体（及其观念）的存续、转变及消失。因此，消极学习的过程包含了明确的系统选择成分。积极学习则不同，其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及他人观念的主动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行为者普遍倾向于借鉴消极经验，因此，消极学习比积极学习更为关键。

(3) 选择。社会演化有两种类型（层级）的选择。第一种，即行为体在其观念领域通过精神活动排除或保留特定观念，进而导致这些特定观念引发的行为得以排除或保留。这种类型的选择包含于消极学习，并且是可以瞬间发生和持续存在的。第二种类型的选择则是消除或者保留系统内的一些单元，并且同时消除这些单元所持有的观念和行為。如果系统内单元出现以下行为，第二种类型的选择将会被触发：第一，误读了外在的物质环境；第二，单元的行为没有吸取系统内自己和其他行为体的正确经验；第三，违反了系统的规范（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4) 建构。从广义上说，建构指的是在国际系统内，行为者自觉地内化概念（规范、观念、制度、记忆、行为规则、自我认同）的过程，以及行为者不自觉地被各种概念影响的过程。有意识的内化和无意识的渗透经

常彼此相互加强,并且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更为重要的是,行为者和系统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一方面,系统会塑造行为体的观念;另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与系统的互动会建构(或重建)整个系统,正在被建构的系统反过来会重新塑造行为体的行为。

(5) 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社会化这一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强调个人心理层面,主要探讨人格如何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其二是从社会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如何影响个人行为。^① 社会化通常通过得到权力支持的制度化、观念的灌输和渗透等实现。在任何系统内,社会化过程往往会带来反社会化行为,意指行为体有意或无意抵制系统压力的行为或过程。因此,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辩证的结果:没有社会化,就没有反社会化。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初期,制度结构是稀疏的,因此社会化的压力较弱,反社会化则更弱。随着社会制度结构变得越来越缜密和严苛,社会化的压力逐渐增大。这种社会趋于结构化、合理化的过程以及对行为者进行观念的灌输和渗透的过程总是以权力作为支撑,这必然驱使许多单元开始反社会化。由于“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抵抗的可能性”,因此,系统中的社会化和反社会化之间始终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例如,国际政治中的南南合作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试图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兴起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这都反映了社会化与反社会的辩证关系。但是,行为者的反社会化并不必然能重塑系统。反社会化的行为即便成功,也不必然导致系统的转变。同时,反社会化也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制衡理念。反社会化通常是一种观念抵制的形式,它所抵制的是系统内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但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制衡通常指的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目的是阻止特定的行为体成为系统内的霸权。

上述五种渠道构成了系统影响和塑造行为体行为的主要方式。它们往往共同起作用而不是独立存在。唐世平指出,目前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要么挑出一两个渠道忽视剩下的,要么仅承认五种渠道但将这五种渠道彼此分离,在指责对方理论缺陷的同时忽略了自身理论的不足。新自由主义

^① 游国龙 《模因学与温特建构主义进程理论——文化选择的剖析与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

者正确指出了现实主义者边缘化了“学习”这一渠道，建构主义者指责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忽视了“建构”的作用，现实主义者指责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忘记了“选择”。

唐世平指出，沃尔兹强调体系结构通过奖惩机制对单元及其行为进行选择，否认学习（以及建构）在塑造单元行为上所扮演的角色。按照这一逻辑，那些顺应体系结构特征的行为体，最终可以走向成功并得以留存，而忽视体系结构的行为体将面临惩罚，最终导致它们可能在国际体系中消失。沃尔兹坚持认为，带有制衡性质的选择可以不借助学习而展开。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沃尔兹的制衡方案在根本上仍依赖于学习：国家只有清楚认识到其他国家能力的大小，才能针对谁进行制衡。正是这一不足，使得沃尔兹在后期不得不承认学习是他权力制衡理论的基本要素，尽管沃尔兹使用的是“模仿”（imitation）这一概念。

建构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是理性选择方法的信徒，它们都忽略了建构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建构主义者认为，观念的传播的确会改变行为者的行为，当行为体内化特定的观念时，这些观念确实开始塑造行为体的行为。尽管很难明确估算在给定的条件下，建构相当于学习、选择、反社会化在塑造行为体行为方面的孰轻孰重，但否认行为体可以内化的观念是错误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观念的传播（如主权观念、民族主义），以及被国家和国家关系理论家内化了的观念在塑造现实国际政治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建构主义和当前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也有其缺陷。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强调积极学习和建构，忽视作为选择的形式之一的消极学习，尤其是历史上单元的选择。在单元层面，消极学习是积极学习必不可少的成分，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基础。没有各种消极学习，单元就不能判断哪种观念是好的、哪种观念是不利的，即便是建构，也需要一些单元之上的压力。其次，与建构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思想来源相符，建构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国际体系内先进的、好的观念的国际化，但普遍忽视单元内化不好的观念的可能性，如欧洲国家对地缘政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君主观念的内化，日本对文明国家的内化，最终给其他国家和自身带来了灾难。^①

^①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7 - 174.

总之,在国际系统中,行为体的行为不能仅用结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物质主义的结构选择来解释,也不能用建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观念主义的内在化、社会习得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事件,往往是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为了更好地解释某些密切涉及演变的国际政治现象,社会演化理论所提供的有关系统塑造行为体行为的五种渠道,即限制、学习、选择、建构、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值得参考与借鉴。通过从物质与观念两个维度来解释国际系统对行为体的影响,以及行为体行为发生改变的原因,或许可以对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反常现象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三) 社会演化理论的适用性

社会演化理论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理论,故将其运用到国际政治研究中,需要根据所分析的具体问题结合具体的研究层次来进行。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演化理论对本文的研究似乎没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因为社会演化理论试图加以解释的,主要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变迁。如根据唐世平的观点,当将生物演化论中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之中,能以一种新的视角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并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伊甸园式的天堂、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更加规范化的世界四个阶段。这种对国际体系转变以及转变原因的分析是以国际体系为重点研究对象的,主要探讨的是体系内部各单元如何互动并最终驱动着体系的变迁,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体系的变迁。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基地”和“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来探讨“伊斯兰国”出现紧凑的、以等级制为特征的组织结构的原因,文章的最终落脚点在体系内部的行为体之上。因此,运用社会演化理论重点分析国际体系的阶段性变迁的这一议题,似乎对本文并没有显著的借鉴意义。

不过,理论本身的适用性有限,并不能否认社会演化理论提出的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对本文的研究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和很强的适用性。首先,在借鉴意义方面。唐世平提出的限制、学习、选择、建构、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可以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分析行为体行为时过于强调结构选择,过于偏向物质主义;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的社会习得,过于偏向观念主义。唐世平给出的五种渠道综合了物质与观念两方面的因素,更为全面地解释了体系对行为体行为的塑

造过程。其次，在理论的适用性方面。研究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重点分析的是在一个体系之中，行为体的行为缘何改变，最终的落脚点是体系之内的行为体。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基地”与“伊斯兰国”相比，其组织结构缘何发生这样的变化，文章的落脚点是“基地”和“伊斯兰国”，即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因此，唐世平关于对国际体系塑造体系内部行为体行为的五种渠道的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层次和方法相契合，这一部分理论内容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因此，本文主要借鉴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在协调物质与观念两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尝试对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变化给出一个社会演化的解释。

三 “基地”与“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及其演化

所谓组织结构，指的是组织内关于职务及权力关系的一套形式化的系统，它阐明各项工作如何分配，谁向谁负责及内部协调的机制。^①“基地”和“伊斯兰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猖獗的恐怖组织，在各自发展过程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组织结构。

（一）“基地”的组织结构

现有的对“基地”组织结构的研究，虽然在对“基地”各个分支结构的具体划分以及归属问题上存在些许争议，但基本上承认“基地”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松散的层级状结构。这种层级状结构由内而外分为四层，越往外同“基地”的联系越弱，基地对其控制也越弱。

第一层，即“基地”中央，主要包括“基地”的核心领导机构。“基地”中央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主要工作是推进“基地”意识形态传播、协调解决“基地”内部纠纷以及为各个分支机构提供战略规划，但基地中央同各个支部之间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基地”的最高领袖是埃米尔。2011年6月起由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 Zawahiri）担任。扎瓦赫里直接领导由十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基地”中央有训练营，还有四个行政机构：军事行动和培训委员会、商务财政委员会、媒体公关和出版委

^① 陈春花、杨忠、曹洲涛《组织行为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第258页。

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各委员会主任对协商委员会负责。

第二层是“基地”的各个分支机构。“基地”目前正式的分支机构有五六个,它们公开表示效忠“基地”,接受“基地”指挥,在全球反美圣战阵线内袭击美国及其盟友,打击所在国政权。这些正式的分支机构包括:阿拉伯半岛分支(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主要打击美国和西方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也门和沙特等地区的政府组织;北非/马格里布分支(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或 AQLIM),其活动范围在阿尔及利亚和马里边境地区,活动范围覆盖西非、北非多国,主要打击对象为美国、法国、西班牙以及北非和西非地区的各国政府组织,目的是征服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根据地在索马里,活动范围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目标是在大索马里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基地”叙利亚分支即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 li-Ahli al-Sham),目前势力遍及叙利亚;^①呼罗珊集团(Khorasan Group),主要打击美国和西方利益目标。^②目前,这些“基地”的正式分支机构已经都被美国及联合国列为国际恐怖组织。

第三层是“基地”外围,即“基地”的盟友。“基地”盟友数量众多,遍布西非、北非经地中海东岸、高加索、中南亚到东南亚等地区。这些恐怖主义势力与“基地”中央或者正式机构合作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其意识形态深受“基地”中央及正式机构的影响。但是这些恐怖主义势力仅与“基地”进行合作,并没有向“基地”宣誓效忠,它们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议程。如中南亚的乌伊运(IMU)、伊斯兰圣战联盟(IJU)等。^③

第四层是“基地”的边缘区。“基地”的边缘区由“基地”的铁杆信徒组成,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不从事恐怖行动,一般都有正当职业,

① Thomas Joscelyn, “Al-Nusra Front Official Explains al Qaeda’s Strategy,” in *Conflict with Former Branch*, <http://www.defenddemocracy.org/media-hit/thomas-joscelyn-al-nusra-front-official-explains-al-qaedas-strategy-conflict-with-former-b/>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② Matthew Levitt, “The Khorasan Group Should Scare US”,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9/why-the-khorasan-group-should-scare-us-111307>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③ 钱雪梅 《“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之一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

它们主要为“基地”秘密搜集情报，筹集资金。^①

通过对“基地”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组织结构由内而外呈同心圆状扩散，总共分为“基地”中央、正式分支机构、外围、边缘区四层。由内而外，“基地”的控制力以及影响力逐渐减弱，使得“基地”的结构呈现出一种松散的层级状态。

（二）“伊斯兰国”的组织架构

“伊斯兰国”作为世界头号恐怖组织，其特殊的组织结构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从上到下分为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严格的职能划分，并且各级之间具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是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目前“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即哈里发由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担任。巴格达迪出生于伊拉克，拥有巴格达的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研究的博士学位，其伊斯兰博士学位和宗教学者的经历为其扩大影响提供了舆论及道义优势，抬高了其在“伊斯兰国”内部的政治地位。^②第二领导层是巴格达迪的地区代理人。巴格达迪有两名副手，阿布·穆斯林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和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图尔克马尼是伊拉克陆军前中校，伊拉克特种部队前军官。图尔克马尼负责“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行动以及所控制的伊拉克省区；另外一名副手安巴里是前伊拉克军队少将，主管伊拉克情报部门中部队的事务，现在主要负责“伊斯兰国”所控制的叙利亚省区。“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和“伊斯兰国”的第二领导层是“伊斯兰国”的决策层，巴格达迪和他的两名副手决定“伊斯兰国”的大政方针以及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③

伊斯兰国的第三领导层由舒拉议会（The Shura Council）和沙里亚委员会（The Sharia Council）构成。舒拉议会的领导人由阿梅利（Abu Arkan al-

^① 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第131页。

^② William McCants, “The Believer: How Abu Bakr al-Baghdadi Became Leader of the Islamic State”,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essays/2015/thebeliever>（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4月14日）。

^③ [英] 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中信出版社，2016，第122~123页。

Ameri) 担任,由9~11名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将决策层的命令传达给执行任务的具体指挥官,并确保任务的完成。沙里亚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巴格达迪亲自担任,主要任务是在“宗教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之下选举哈里发、执行伊斯兰教法、制定宗教政策和奖惩措施以及监督意识形态等。^①在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之下是若干个执行具体任务的部门或委员会。根据其执行任务的内容,可将其划分多个部门。关于这些部门的划分,目前学界存在着“七部门说”“八部门说”“九部门说”“十部门说”等多种观点。“七部门说”认为,“伊斯兰国”有七个执行具体任务的部门,分别是军事部门、金融部门、法律部门、安全部门、后勤部门、信息部门、媒体部门等。“八部门说”认为,“伊斯兰国”内部存在着内政部、通讯部、财政部、国防部、宣传部、作战部、伊斯兰教法部以及情报部等。“九部门说”认为,“伊斯兰国”内部存在着领导部门、协商部门、军事部门、财政部门、情报部门、安全部门、战士协助部门、媒体部门、法律部门等九个部门。“十部门说”认为,“伊斯兰国”内部存在着战争部门、管理部门、协调部门、财政部门、社会部门、治安部门、武器部门、炸药部门、战俘部门、外籍士兵部门等十个部门。^②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从侧面反映出“伊斯兰国”在执行具体任务上分工明确、权责明晰的特点。

“伊斯兰国”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的运转最终都必须落实在其所控制的疆域之上,否则“伊斯兰国”各个管理部门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伊斯兰国”境内管辖十二个省区。在伊拉克境内有七个省,分别是巴格达省、安巴尔省、萨拉赫丁省、大区域省、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以及中南部幼发拉底河省。在叙利亚境内有五个省区,分别是拉卡省、阿勒颇省、代尔祖尔省、霍姆斯省、哈塞克省(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还有一个大马士革省,因此“伊斯兰国”共有十三个省区)。^③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是凭借着在地方设立的这些“省政府”来控制自己的

① 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与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

②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the Islamic State.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4/12/profiling-islamic-state-lister>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③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the Islamic State,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4/12/profiling-islamic-state-lister>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管辖的区域，行使自己的权力。

通过对“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伊斯兰国”以所占领的土地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统治结构，共分为四级：由上到下依次是易卜拉欣哈里发、哈里发的地区代理人、舒拉议会以及沙里亚委员会、分管具体任务的职能部门。每个层级有着清晰的权责划分，上下级之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这种相对完整、高效的以等级制为特征的组织结构，确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伊斯兰国”的综合实力。

（三）恐怖组织结构的演化

“伊斯兰国”已建立了一个“准国家”。根据政治学上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实体，具有明确的领土范畴和确定的居民；第二，在特定疆域内合法垄断暴力，国家权力具有特殊的性质，即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第三，政治的世俗化和专业化，以及官僚制度的建立。^① 由此出发，“伊斯兰国”绝算不上是一个国家。首先，“伊斯兰国”建立的政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政治学上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国家的组织要素，是体现、达到国家目的和行使、表现、执行、解释国家意志的机关”^②，无论是“伊斯兰国”在其统治区域内所设立的各个上层管理机构还是在各省区设立的“省政府”均不符合这一定义。其次，“伊斯兰国”的主权并未得到各国的承认，“伊斯兰国”也并没有对内高于一切，对外完全独立的权力。最后，成为一个国家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国际社会的认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伊斯兰国”是一个国家实体。因此，由于上述条件的不满足，尽管“伊斯兰国”占据了一定的土地，控制着一定的人口，但其绝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能算是一个“准国家”行为体。

即便“伊斯兰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其具有类似于国家的紧凑和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根据组织行为学，组织结构由以下四部分构成，其绩效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衡量：第一，职能结构，即对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各项工作的分配，考察维

^①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92页。

^②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第四版）》，第113页。

度包括职能是否交叉、冗余、分散、错位等;第二,层次结构,指管理层次的构成以及管理者所管理的人数,考察维度包括分管职能的相似性、授权范围、决策复杂性等;第三,部门结构,指组织中管理部门的横向构成,考察维度是一些关键部门是否缺失;第四,职权结构,即各层次、各部门在权力和责任方面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考察维度为权责关系是否对等。^①如果一个组织在职能结构、层级结构、部门结构、职权结构及其各个考察维度上不同于另外一个组织,并且这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这种组织结构的变化可以被视作一种演化。如果一个组织内部在职能结构、层级结构、部门结构、职权结构及其各个考察维度上不同于过去,则说明该组织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当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时,上述观点同样适用。

首先,就职能结构方面来看。“基地”的职能结构是分散和交叉的。“基地”中央同各个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基地”正式分支机构虽然听从“基地”中央的指挥,但是有的也有自己的地区目标和行动方案。如,“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地区目标是征服马格里布及伊比利亚半岛,“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则主要是征服阿拉伯半岛及也门地区。虽然“基地”的各个正式分支机构活动的总目标是在全球反美圣战阵线内袭击美国及其盟友,打击所在国政权,但每个分支机构袭击何处、何时发动袭击、怎样袭击,“基地”中央不会发布明确的指令,这使得各个分支机构行动虽有明确的总目标但不能彼此照应。“基地”组织结构的第二层即各分支机构同“基地”的关系尚且如此,“基地”外围以及边缘区同“基地”中央的职能划分则更为重复和模糊。因此“基地”的职能结构是分散和交叉的。然而,“伊斯兰国”有一套完整的决策过程,即由哈里发巴格达迪和他的两个地区代理人图尔克马尼和安巴里进行决策,由舒拉议会进行政策传达,由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这样的职能结构既有总目标也有分目标,各部门在完成各自分目标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总目标的完成。因此,“伊斯兰国”的职能结构相对清晰明确。

其次,就层次结构来看。“基地”组织结构中的每一层都是相对独立的部分,每一层的构成也十分类似,每一层也有具有决策性质的机构,尽管

^① 参见陈春花、杨忠、曹洲涛《组织行为学》,第266~270页。

有的层级不明显。然而，“伊斯兰国”的层级结构由上到下是一种直线型的、金字塔式的结构，核心决策层人员较少，随着层级不断降低，人数随之增加，这使得决策更加迅速、执行更有保障。

再次，就部门结构来看。“基地”对部门分工并没有明显的划分。就横向分工来看，“基地”的每一层内部，决策部门、执行部门都是十分模糊的；就纵向分工来看，“基地”内部也没有固定的决策部门、固定的传达部门、固定的执行部门。“基地”中央、正式分支机构、外围机构各自为政，部门分工十分模糊。相反，“伊斯兰国”内部的部门结构则十分明确。就纵向部门结构来看，以巴格达迪、图尔克马尼以及安巴里组成的决策部门仅负责决策、舒拉议会仅负责传达“政令”，具体执行部门仅负责执行各项任务，“伊斯兰国”由上到下决策、传达、执行部门相对固定；就横向部门结构而言，“伊斯兰国”的第四级设有分管具体任务的各个职能部门，划分详细并且各部门有着明确的分工，如财政部负责“伊斯兰国”的资金募集工作，为“伊斯兰国”的运作争取资金支持，宣传部负责对外宣传、人员招募等工作，军事部门负责抢占地盘和抵御各方打击等。这种部门分工明晰的结构使得各项任务的完成更为高效。因此，“伊斯兰国”的部门结构相对完备合理。

最后，就职权结构来看，“基地”与各个分支机构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基地”外围的各机构也并没有对“基地”宣誓效忠，“基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实质上十分松散。“伊斯兰国”则不同，“伊斯兰国”由上至下共分为四级，每一级之间都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如，巴格达迪在“伊斯兰国”内部实行极权主义，讲究绝对服从，对异见采取零容忍，并设置安全情报委员会来铲除异己。因此，“伊斯兰国”的职权结构与“基地”相比也更为严苛。^①

值得注意的是，就恐怖组织内部的结构安排来看，“伊斯兰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要强于“基地”，但就这两种组织结构长期的运转效果来看，“基地”的组织结构也有其优势。“基地”的组织结构是松散的层级状结构，其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与“基地”的联系相对松散。一方面，“基地”的核心层藏匿于地下，对其构成致命打击相对困难；另一方面，“基地”的

^① 李伟 《“伊斯兰国”怎样“治国理政”》，《世界态势》2015年第9期。

各个分支机构、外围机构以及边缘区信徒并未受“基地”的严密控制,流动性较强,遭受打击后可以迅速转移,这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其进行打击的难度。“伊斯兰国”则不同,当我们以整体的视角审视“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时,其组织结构也存在不足。“伊斯兰国”相对高效明晰的职能结构、层次结构、部门结构、职权结构,是“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类似国家的一部分原因。而这套组织结构的运转有赖于占据一定的“领土”。^①也正是基于对所占地域的控制,“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相对公开和固定,为国际社会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标清了明确的指向,即为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提供了一个“目标靶”,这在客观上增大了“伊斯兰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旦“伊斯兰国”领土受到压缩,其统治将会大打折扣。^②随着国际反恐势力彼此之间关系的相对缓和,“伊斯兰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③因此,对于“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绩效,应当以全面的、动态的视角来审视。

四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变迁: 社会演化理论的解释

下文将借鉴社会演化理论有关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试析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出现变化的原因。

(一) 五种渠道分别塑造着“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

中东地区纷乱的政治局势,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局的动荡,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中东破碎的地区政治体系,为“伊斯兰国”的崛起至少提供了三方面的帮助。

首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中东局势为“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一方面,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平衡。伊拉克位于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和以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世界的交界地,尽管伊

① 严帅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7期。

② Graeme Wood, “What ISIS Really Wants”,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3/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 (最后访问时间: 2016年4月17日)。

③ 《法军战机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新华网,2016年5月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5/01/c_1118779227.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16年5月2日)。

拉克内部什叶派占多数，但历史上一直是由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来统治。2003年，美国入侵了伊拉克，并在所谓的“民主改造”计划下，使什叶派通过选举上台，逊尼派的上层精英基本上都被赶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因此在战后，逊尼派的聚集区反美情绪高涨，反美、反政府武装力量不断发展，“伊斯兰国”的前身，扎卡维领导的“基地”伊拉克分支（AQI）混迹其中，吸收了大量进行圣战的穆斯林，实力大为增强。

其次，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平衡，取而代之的是两大教派的政治角力。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中东地区的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即阿拉伯世界、伊朗、以色列、土耳其以世俗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大致维持着这一地区的平衡。但在入侵伊拉克后，这种基于世俗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以教派为分野的政治力量集团：一个是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构成的什叶派集团，一个是由中东地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逊尼派集团。两大集团分别支持分属各自阵营的各个团体，“伊斯兰国”的各个前身组织，如“基地”伊拉克分支（AQI）、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都得到了逊尼派集团或明或暗的支持。始于2010年年底的中东变局以及西方国家对变局的干预，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这场所谓的“革命运动”使得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强人政权被推翻，之后在西方势力干预下建立起来的所谓的民主政府并未对国内局势形成强有力的控制，导致这些国家深陷动乱之中，这为“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拉克“伊斯兰国”协助“基地”在叙利亚建立了“基地”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或“支持阵线”。同时，为了尽快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间接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势力。

最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了亚太地区，相对减弱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使得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面临的外部压力减小，这同样为“伊斯兰国”的发展提供了难逢之机。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主义势力所受的压力急剧减弱，获得迅猛的发展势头。2013年8月，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力量与之前在伊拉克的极端主义力量合并，成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并于2014年初攻占逊尼派重镇费卢

杰、2014年6月攻占伊拉克北部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宣布建立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①因此,可以看出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进行“亚太再平衡”的外交调整后,“伊斯兰国”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强劲反弹的势头。

通过上述分析,中东这一区域性的政治体系确实对“伊斯兰国”这一国际行为体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中东地区破碎的政治体系为“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的崛起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应当包括: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极端反美情绪以及教派纷争,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及西方势力插手带来的社会动荡,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中东政治失序。“伊斯兰国”恰好利用了这些条件,实现了自身实力的壮大。

“伊斯兰国”领导人对其“先驱者”的思想的继承和内化,是“伊斯兰国”这一“准国家”政治实体得以出现的内部条件。唐世平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可以采用自己和他人“成功”的观念、行为、文化和制度,即“积极学习”。更进一步,如果行为体遵从并且吸收这种观念,且行为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那么该行为体就被这种观念“建构”。^②“伊斯兰国”领导人对扎卡维思想的继承和内化,就是这种“积极学习”和“建构”共同作用的体现。首先,“伊斯兰国”的领导人继承了扎卡维的思想,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而“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是“基地”须长期努力的最终目标,目前的国际形势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的势力十分强大,在不能极大地消耗美国的情况下,“基地”即便建立起“哈里发国家”,美国也最终能够将其颠覆或消灭;二是“基地”领导人认为,当前“圣战”事业并未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普遍支持,许多穆斯林对美国仍然抱有侥幸,对美国的痛恨程度不够。因此,“基地”领导人不支持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家”。

与“基地”领导人的态度不同,扎卡维并不关心普通穆斯林对美国的态度,扎卡维认为,不管普通穆斯林的态度如何,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都

^① 李绍先 《“伊斯兰国”崛起与国际反恐新难题》,《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8 - 170.

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①“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直接继承了扎卡维这一观念。在2014年7月的演说中，巴格达迪称“建立哈里发国家是穆斯林的责任，这一责任已经被遗失了好几个世纪，穆斯林因失去它而有罪，应当尽力寻求它的建立”^②。由此可见，巴格达迪的观念与扎卡维一脉相承，均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此后，巴格达迪不断内化这一观念，积极致力于“伊斯兰国”的筹建，不断将其实体化。据统计，在“伊斯兰国”的对外宣传中，有关战斗和乌托邦的描述占到了宣传总量的89.69%。^③通过对外描述“伊斯兰国”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宗教活动、社会管理、经济活动等，巴格达迪对外将“伊斯兰国”打造成了一幅类似乌托邦的美好形象，使得“伊斯兰国”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对战斗的宣传有助于增强“伊斯兰国”内部的凝聚力，可以维持“伊斯兰国”的内部团结。在“伊斯兰国”的内部治理方面，该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教育机关、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巴格达迪的积极筹备下，“伊斯兰国”越来越符合“准国家”的基本形态，实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在扎卡维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提出了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五步走”策略：第一步，迁徙，即将全世界的穆斯林召集到特定的“圣战”地点，以扩充建国的力量；第二步，集合（Jama'ah），即对这些迁徙者进行“圣战”前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圣战技能；第三步，摧毁非法统治者（Destabilize Taghut），即对异教徒和叛教者发动暴力袭击，尽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营造无政府状态；第四步，巩固（Tamkin），即利用暴力活动造成的权力和秩序真空，不断扩充统治基础；第五步，建立

① 参见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pp. 11-12。

② James Kitfield, “How To Stop Islamic State's Escalation Dominance”, <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12/how-to-stop-islamic-states-escalation-dominance/>（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③ Charlie Winter, “Documenting the Virtual ‘Caliphate’”, <http://www.quilliamfoundation.org/wp/wp-content/uploads/2015/10/FINAL-documenting-the-virtual-caliphate.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4月14日）。

“哈里发国家”，即建立一个严格以沙里亚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①唐世平认为，社会演化中精神维度的变异即新观念的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即新观念的自生、观念互补、外来观念的入侵。不仅如此，社会演化中精神维度的变异不是盲目的，人为地解决问题或者达到目标与预期可以创造某种观念。“伊斯兰国”领导人提出的建国“五步走”战略，可以被视为“伊斯兰国”在继承扎卡维须尽快建立“伊斯兰国”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理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伊斯兰国”领导人对扎卡维“建国”观念的积极学习和内化以及创新，是“伊斯兰国”组织结构发生演化的内部原因之一。

国际体系中的选择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经由行为体的精神活动排除或保留一些特定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导致的行为；另一种是消除或保留系统内的一些单元同时消除这些单元所持有的观念和行為。“伊斯兰国”高效的组织结构得以保留，主要与第二种类型的选择有关。大体而言，“伊斯兰国”内部类似于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其他宗教极端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伊斯兰国”在当前体系压力的选择之下暂时得以生存，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也随之得以保留进而得到巩固。

下文以“基地”为比较对象，从政策制定、政策传达以及政策实施三个角度说明“伊斯兰国”内部特殊的组织结构为其提供的优势。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基地”中央是其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相对来说“基地”核心决策相对高效，但由于“基地”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其外围的各机构并不一定向其表示效忠且也有自己的政治议程，而边缘区信徒更是各自为战。因此，从全局来看，基地的政策制定环节难以统一。与“基地”模糊的政策制定环节不同，“伊斯兰国”有明确的政策制定机构，即由巴格达迪及其两个副手安巴里、图尔克马尼所组成的政策制定机构，由于人数较少、职能划分明确，“伊斯兰国”政策制定环节较为统一和高效。

就政策传达方面而言，由于“基地”与各个分支机构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基地”主要通过传真、移动电话、互联网向全世界遥控指挥自己的成员。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有自己的政策传达机构，即舒拉议

^① 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

会，舒拉议会的职责就是将决策层的命令传达至具体的指挥官，以确保任务的完成。

就政策实施层面而言，尽管“基地”中央也有分管军事、宗教、宣传和财务的委员会^①，但是“基地”的政策实施效果与“伊斯兰国”相比相差甚远。“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第四级，设有多个分管具体领域的部门，每个部门各司其职，高效运转。如“伊斯兰国”的军事部门专业化程度较高，其中许多管理人员都是伊拉克及叙利亚的高级指挥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此外，“伊斯兰国”的军事部门下还管理着许多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等武器，增强了“伊斯兰国”的军事装备实力。“伊斯兰国”所管辖的军队，根据国籍、语言和地区进行编组，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②“伊斯兰国”的财政部门为“伊斯兰国”募集到大量的资金，大规模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有走私石油赚取差价、绑架人质换取赎金、拉拢地区大国获得资金支持^③，据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有20亿美元的资产。^④

“伊斯兰国”的宣传部门也十分专业。“基地”的宣传策略主要是通过重复其领导人的讲话视频和讲话录音来实现，这样的宣传策略过于单一，影响力不强。与“基地”的宣传策略不同，“伊斯兰国”有自己的一套宣传体系。这一宣传体系有三个特点：第一，宣传内容丰富，既有展示“伊斯兰国”暴力恐怖的一面，也有树立“伊斯兰国”“安居乐业”美好形象的一面；第二，宣传手段多样，主要包括讲话录音、讲话视频、海报、网站宣传页、电子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等，除此之外，“伊斯兰国”综合运用“脸谱”“推特”等社交平台账号传播其极端思想，对年轻群体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第三，宣传质量较高，“伊斯兰国”的宣传物制作精良，大幅度提升了其影响力。如“伊斯兰国”制作的视频清晰度高、视频光感、

① 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第130页。

② “Islamic State Fighter Estimate Tribles - CIA”，BBC News，12 September，2014，<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169914>（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③ 李景然《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

④ 参见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Lina Khatib，“What the Takeover of Mosul Means for ISIS”，<http://carnegie-mec.org/2014/06/12/what-takeover-of-mosul-means-for-isis/hdmm>（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音效和背景音乐结合得很好,其宣传网页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等多个版本,这直接扩大了其宣传受众,扩大了影响范围。

“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第四层级设有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社会部门”,巩固了“伊斯兰国”的统治基础。一方面,“伊斯兰国”通过“社会部门”强化自身对所辖区域的控制,强化自身在这些区域的军事及政治存在,如建立伊斯兰法庭,严厉处置破坏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另一方面,“伊斯兰国”通过社会部门向所辖区域提供良好的民政服务,改善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状况,为自身树立完美形象。如“伊斯兰国”在占领一地之后,往往率先修缮该地的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稳定该地的物价,为当地的公职人员定期发放薪金等,许多逊尼派居民甚至认为,“伊斯兰国”统治区域下人民的生活状况要优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区域。因此,可以得出“伊斯兰国”“社会部门”的积极作为增强了“伊斯兰国”统治的“合法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基地”相比,“伊斯兰国”的内部组织结构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势。“伊斯兰国”这种类似国家的统治方式提高了其内部的运作效率以及影响力,增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在美、俄等国的多轮空袭之后,“伊斯兰国”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使其可以快速恢复实力。因此,“伊斯兰国”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使其经受住了当前国际体系压力的选择,最终在当前体系的选择压力下得以保留,进而“伊斯兰国”这种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得以保留并不断被巩固。

“伊斯兰国”能够发展出类似于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又一原因是其对现存国际体系的观念抵制。首先,“伊斯兰国”敌我对立的二元世界观使其从根本上拒绝现代国际体系。“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在2014年7月的宣教中强调,“当今世界已经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由穆斯林和‘圣战者’组成的信仰伊斯兰的阵营,另一个阵营由卡菲尔和伪信者组成,它包括犹太人、十字军及其盟友和其余的卡菲尔国家与宗教,并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由犹太人进行动员”。^①“伊斯兰国”这种对世界进行绝对的敌我划分的做法,使其不可能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这使得“伊斯兰

^① 参见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Seth G Jones,“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Qae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RR637.pdf(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14日)。

国”在国际体系中树敌的同时增强了“伊斯兰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其次，“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政治共同体“乌玛”的绝对追求和对伊斯兰真主主权观念的绝对信奉使其抵制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依靠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①，推进了“哈里发国家”的实体化。“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巴格达迪认为“伊斯兰国的建立使得乌玛世界恢复了团结和统一，因为叙利亚人不再是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不再是伊拉克人。地球是真主的，这是一个属于所有穆斯林的国家。”^②这种观念既反对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也反对国际社会世俗的权力结构与国际制度，在巩固“伊斯兰国”统治思想基础的同时也对“伊斯兰国”的“建国”活动形成了指导，进而推进“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伊斯兰国”类似于国家的组织结构的产生和存续的过程中，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即限制、学习、建构、选择、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过程产生了影响。

（二）五种渠道作为一个系统共同塑造着“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

如前所述，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应当是一个系统，它们共同起作用而不是独立的起作用，以塑造行为体的观念、身份和行为。因此，挑出一两个渠道同时忽视剩下的渠道，或者仅承认五种渠道但将它们彼此分离，均无法全面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演化情况。在分析“基地”与“伊斯兰国”组织结构为何会出现明显变迁这一问题时，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下面首先论述从单一渠道解释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变化时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从五种渠道作为一个系统的角度解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发生演化的原因。

从结构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本体出发，国际体系中行为体行为改变的

① 刘中民 《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

② 参见周明、曾向红 《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Abu Bakr al-Baghdadi,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s://ia902501.us.archive.org/2/items/hym3_22aw/english.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16年4月14日)。

原因主要是结构的作用,即“结构选择”。如果单纯从结构选择的角度出发,无法解释在相同的体系压力下(国际社会中以美俄为首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所采取的抵制恐怖主义的行动),为什么与“伊斯兰国”同时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恐怖组织仍然没有发展出类似于国家的组织结构。

从建构主义的观念主义本体出发,国际体系中行为体行为的改变主要是通过社会化,即“社会习得”。如果从社会习得的角度出发,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拥有“建国”情结的其他恐怖组织却没有建立起类似“伊斯兰国”这样实体化程度较高的“哈里发国家”。如2011年5月,隶属于“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的伊斯兰军事集团“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aria),在控制了也门阿比扬省大部分地区后宣布以津吉巴尔市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但最终被也门政府军消灭。尽管此次活动失败,但恐怖组织建国活动并未停止。2012年1月,恐怖组织在也门南部拉达地区、阿比扬省洛德尔、舍不瓦省、亚赞地区接二连三宣布建国,但均未成功。^①因此,单纯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或者单纯从观念主义的角度无法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变迁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应当协调处理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对这一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

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行为的五种渠道,即限制、学习、选择、建构、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作为一个系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首先,限制是其余渠道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证。国际系统中任何现象的发生和演化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外在环境始终限制着行为体在精神和物质上能够做成什么。其次,学习、选择、建构和反社会化这四种渠道以学习为纽带彼此相互联系。观念的产生并不是完全随机和自发的,总是依赖于不同程度的学习。选择,这一渠道包含了两种类型,一方面对观念的选择仅是将特定的观念挑选出来,这一过程是无法形成观念和行为的;另一方面对单元的选择也根本依赖于通过学习而被塑造了的单元之上。建构也十分依赖于学习,如果没有了学习,行为者无法内化特定的观念,进而无法被建构。反社会化也十分依赖于学习,只有当行为者能够学习一些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时,行为者才有抵制这些观念的可能。^②由此可见,五

^① 钮松、徐曹宇 《“基地”组织当前“建国”活动及其走向》,《亚非纵横》2014年第3期。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73.

种渠道作为一个系统共同塑造者行为体的行为，但学习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也有五种渠道共同发挥作用。首先，“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产生和演化都依赖于一定的地区局势，或者说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演化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美苏在阿富汗的政治角力以及后来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安全真空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造成的政治恶果，“基地”和“伊斯兰国”难以产生并发展壮大，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演化也无从谈起。其次，学习和建构这两种渠道指导着“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发展方向。即便地区局势为“伊斯兰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就一定沿着“准国家”的方向演化。“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对扎卡维“建国”思想的继承和内化以及适度创新为“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竭力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使“伊斯兰国”实体化，“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发展也大致遵循这一路径。最后，选择和观念抵制这两种渠道使得“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得以保留并不断被巩固。“伊斯兰国”领导人建立实体化“哈里发国家”的企图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一样，与现行的国际体系规范格格不入，“伊斯兰国”也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打击。与其他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在体系压力的冲击下暂时得以保存是因为其内部组织结构的高效运转暂时抵挡住了当前国际反恐势力对其造成的压力，其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观念抵制为其树立了屏障，保证了其组织结构内部的稳定。在体系压力的选择之下，“伊斯兰国”特殊的组织结构在众多恐怖组织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延续。

总之，“伊斯兰国”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出现，是上述五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限制这一渠道为“伊斯兰国”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使得“伊斯兰国”的崛起成为可能；学习和建构这两个渠道为“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演化指明了方向；选择和观念抵制这两个渠道保证了“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这种演化得以“成功”并暂时得以延续。五种渠道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在五种渠道的共同作用下，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实现了演化。

社会演化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演化中没有“最

适合”(fittest)的事物,只有“更适合”(fitter)的事物。^①相应的,将社会演化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所得的理论成果也带有时间的因素,即国际体系通过五种渠道塑造行为体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伊斯兰国”发展出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是“伊斯兰国”内部类似于国家的组织结构高效地运转,且能抵挡住外部体系压力对其构成的威胁。一旦目前支离破碎、彼此掣肘的国际反恐联盟加强反恐行动的协调,那么,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力量必然声势大增,其面临的体系选择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其“目标靶”的劣势将会进一步凸显。如此,“伊斯兰国”能否延续其目前的组织结构,将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或许,在生死存亡之际,“伊斯兰国”也将像“基地”一样转入地下,采取以松散、网络化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只是其合法性和动员能力也就随之而降低。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比较“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结构差异的基础上,试图解释“伊斯兰国”发展出国家式组织结构的原因。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单纯地从物质主义的结构选择或观念主义的社会习得的角度无法对这一变化给出全面合理的解释。本文将社会演化理论引入国际政治所得的理论成果,即国际体系塑造行为体的五种渠道(限制、学习、建构、选择、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在协调物质与观念两个层面因素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一演化做出解释:中东地区破碎的政治版图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动荡的政治局势,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可利用的外部条件,“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在继承并内化其“先驱者”扎卡维“建国”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具体化进而利用了这些条件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伊斯兰国”内部类似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其他恐怖组织不具备的优势,并使其经受住了当前体系压力的选择,其组织结构得以保留进而得到巩固,同时“伊斯兰国”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观念抵制保证了其内部组织结构的稳定。在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恐怖

^①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4.

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演化。然而，由于国际反恐力量之间关系的改变以及“伊斯兰国”据有领土的弊端日益显现，“伊斯兰国”组织结构的存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本文在理论与政策两个方面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在理论方面。第一，应当重视系统研究而不是将视线仅仅放在“结构—行为者”的互动之上。国际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一系统由行为者（agents）（如个人和个人的集合）、制度体系（institutional system）（如结构）、物质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进程（processes）（如行为、互动、制度化、社会化、内在化）等要素构成。^① 如果仅着眼于结构和行为体，则会遗漏系统中其他部分，导致分析问题不全面。此外，国际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其内部各个要素彼此进行互动，如行为体之间、行为体与结构之间、行为体与物质环境之间等。如果只着眼于结构与行为体这一种互动模式，则会忽视系统内其他类型的互动，使得分析问题的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分析问题的视角应当是系统的、动态的、多渠道的，而不是结构的、静态的、单一渠道的。

第二，应当进一步将时间因素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即“给予达尔文应有的地位”^②。国际政治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系统，如果用静止的眼光是无法看清其本质的。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于各自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力难有高下之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国际政治中的时间因素，即国际社会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过渡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两个理论分别更适合解释国际政治某一阶段的历史而不是整个历史（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更适合解释历史上国家的征伐，防御性现实主义更适合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大国时代”）。^③ 因此，更进一步，在解释国际政治现象或事件时，也应当重视时间因素，分析某一现象的演化过程及原因，把握其发生变化的本质。

其次，在政策方面。本文的政策启示分为物质与观念两个方面。第一，物质方面的政策启示。物质方面的政策启示更多的与上文提到的限制、选

①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53.

②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0.

③ 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6-110.

择两种机制相关。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应当尽力维持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稳定,同时将始于2010年的中东变局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美国应该适度调整其战略,增强其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以对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形成压制,消除“伊斯兰国”得以发展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以及阿拉伯国家应当尽力达成合作共识,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增强“伊斯兰国”所面临的选择压力。

第二,观念方面的政策启示。观念方面的政策启示更多的与上文提到的学习、建构、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等机制相关。与“基地”相比,“伊斯兰国”更加极端和残忍,排斥异教徒、攻击什叶派穆斯林以及不服从其统治的逊尼派穆斯林。上文提到的学习、建构与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这三种渠道也应当被国际社会利用,以传播正确的宗教观念,进而争取这类温和势力,避免其被“伊斯兰国”宗教极端思想以及“建国”观念所蛊惑,在分化“伊斯兰国”大众支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打击。

此外,限制、选择、学习、建构、反社会化或观念抵制作为一个系统共同影响着“伊斯兰国”的发展。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物质手段与观念手段也应当相互协调、同时使用。目前,国际社会通过物质主义的手段打击“伊斯兰国”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效,如以美国为首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对其空袭严重削弱了“伊斯兰国”的资金募集系统和人员招募系统等^①,但是从观念层面对其进行打击的手段亟待加强,这是国际社会加速摧毁“伊斯兰国”更须关注的领域。

囿于资料来源的限制和无法从事田野调查的局限,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局限:其一,文章的理论创新程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文的分析工具主要是社会演化理论,这一理论全面引入国际政治研究的时间较短,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匹配程度以及解释力度仍存在一定争议。因此,本文通过借鉴社会演化理论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及所得出的观点、结论,只是一种启发性的研究,是否正确,还需事实的检验。其二,就现实层面来看,“伊斯兰国”的最新发展态势表明,其建立的“准国

^① Kathleen Bouzis,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_U. S.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0, June 2015, p. 894.

家”式组织结构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包括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动员动力日益衰落等；而“基地”的风头虽被“伊斯兰国”压过，但其组织结构具有的灵活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① 鉴于此，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方向，仍需要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责任编辑: 闫 伟]

^① Graeme Wood, “What ISIS Really Wants”,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3/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 (最后访问时间: 2016年4月17日); Islamic State will lose, says Obama., BBC News, 11, February,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1425384> (最后访问时间: 2016年4月16日)。

ac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 He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hree topic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 which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natur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individual self. These are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eng Shuzhi points out that th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in itself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created by the human being , which makes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s ideology and culture as the core and the conscious activities of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s the principal lin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is the summar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at embody the rule of interaction.

Keywords: Civilization Exchange ,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 Conception on the Civilization

From Al-Qaeda to Islamic St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eng Xianghong , Liang Chen

Abstract: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terrorist group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mpared to Al Qaeda's loose hierarch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Islamic state has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at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ict hierarchy and centralism. In a sense , from al-Qaeda to Islamic State ,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s evolv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evolu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ragmented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 especially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upheavals in Iraq and Syria , provide a very favorabl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tate and the leader of the Islamic State inherits and internalizes the thoughts of its predecessor , Abu Musab al-Zarqawi , on estab-

lishing a caliphate and setting up the Islamic Stat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Islamic state is similar to the nation-state and provides a lot of advantages that othe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ack.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slamic state has apparent disadvantages and its existence faces some major challenges now. In the futur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including both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l-Qaeda, Islamic State

The Threat of ISIS in Libya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t

Jiang Tao

Abstract: Five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Libya remains in a state of chaos and conflicts. ISIS in Libya exploited the weakness of Libya's governance to expand and rise rapidly, acting as a spoiler and as a governor in the areas under its control. ISIS in Libya poses a threat to Libya's transiti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to Europe's stability. In theory, we may solve the problem of Libya's ISIS through military oper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but, in practice, there are quite a few obstacle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SIS and other armed groups, Libya will remain in a weak and fragmented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ISIS, Libya, Transition, Anti-terrorism

Exploring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Zhao Guangcheng

Abstract: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One Road" is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win-win idea,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will focus on advocating the "Silk Road Spirit",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to